doi:10.3969/j.issn.1001-8794.2025.03.003

新时代社区教育的空间转向及其实践理路

马晓斐[1],后慧宏[2]
(1.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2.首都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北京 100037)

【摘　要】社区发展理念、内容及场所的转变,致使相关研究从注重物理空间逐渐转向关注人与自身所处空间的相互作用。“空间”作为社区教育实施的必要条件,深刻影响着社区学习者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基于空间社会学视角重新审视社区教育空间,发现其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也是一种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在社会流动的驱动下,社区教育空间在拓展延伸、开放互通的过程中,逐渐从“聚合封闭”转向“场景开放”,从“制度规划”转向“情感共系”,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由此推动了社区教育场所的重构、内在情感的联结及教育价值取向的转变。基于“物理—社会—文化”三重维度探索社区教育空间转向的实践理路,以期为新时代社区教育实践研究提供学理思考与经验启示。

【关键词】社区教育;空间转向;实践理路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25)03-0018-06

一、问题提出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作用”[1]。社区教育是促进社区学习者生命成长及全面发展的教育,作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载体,其始终坚持以居民的生存、生活、精神需求为基础,以居民的自我完善和生命享受为旨归[2]。

然而,随着理性主义治理模式的渗透,社区教育的行政管理现象却愈发明显。一方面,以科层化为基础,在行政区划基础上的社区空间演变为一种彼此疏离的居住结构。社区学习者被视为社区行政管理体系的延伸,因而难以形成学习型自组织。另一方面,以控制化为基础,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强调的“寓管理于服务”,实则是以服务之手段达控制之目的[3]。社区学习者作为“被管理者”,因缺乏情感互动而难以将自我价值观念与社区场所意义进行有机连接。随着加速社会和流动社会的演进,多种社会力量渗透于城市社区空间,并在其中生长、合作及较量。空间布局的片断化、功能的碎片化和社会隔阂等因素,导致既有连续的组织空间秩序逐渐崩溃,由此所衍生出的不确定性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社区教育空间。

目前,国内学界有关社区教育空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价值阐述、关系建立、空间生产等方面。如钱旭初等(2022)[4]以社区教育空间实践类型为切入点,在探讨空间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种突破原有边界、呈现区域空间多样性的新型空间关系;陶磊等(2017)[5]通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阐释了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及其生产机制,分析了其空间生产的问题征候,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行动策略。就已有研究而言,无论是宏观解读,还是微观分析,总体上仍缺乏从空间视角[6]出发的研究。具体表现为,在以往研究中,对社区教育空间除物理属性之外的关系意蕴及价值属性反思不足。基于此,本研究主要通过引入空间社会学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聚焦于城市社区,着重探究社区教育的空间转向及其实践理路。

【收稿日期】2023-10-09
【基金项目】2021 年度全国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文科理念下教育学‘双循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项目编号为 2021150002;2023 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项目编号为 BZKY2023035
【作者简介】马晓斐(1997—),女,银川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教师教育研究;后慧宏(1990—),男,甘肃岷县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师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二、空间社会学理论分析框架及其适切性

空间是一切事物和要素存在的根本方式。由于时间和历史决定论始终占据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主流位置,空间在以往被视为一种僵死的、同质化的客观存在。20 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生态语境的变化,“社会空间”概念被广泛使用,学者们对“空间”的重视似乎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集体共识,继而引发了“空间转向”研究。这种“转向”推动着空间本体价值与内在意义的复归,“空间”被赋予除物理属性外更为丰富的“关系”意蕴,并被视为一种人与人、人与事物间的关系状态[7]。这意味着社会空间中的个体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均可被看作空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空间的实践(空间的感知层面)、空间的表征(空间的认识层面)与表征的空间(空间的精神层面)“三位一体”的空间生产理论。具体而言,空间的实践作为有形可感的物质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产物;空间的表征作为构想性、观念性的意识形态空间,干预并控制着现实空间的建构;表征的空间作为物质与精神、感知与想象一致的空间,是人类生存的体验性空间[8]。空间生产既包括空间事物的生产,又包括空间本身的生产,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一方面,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形塑着新的社会空间,并为新社会空间的建构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空间本身的生产及变化也影响着空间中的生产,既包括物理性空间的重置与改造,也包括各种社会关系及价值观念的改变[9]。

社区教育空间是一种以开展社区教育教学活动为主的物质性、动态性环境,既包括各种实体空间及虚拟空间,又包括“学习主体和学习空间之间的交互性情感关系”[10]及在此基础上所生成的文化空间。一方面,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充分交融,有利于生产出具有整体意义的社区文化空间。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的生长也促进了物理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即,居民以众人之力改造社区环境的同时,也拓展、升级了物理属性意义上的社区教育空间,实现了社区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对物理空间的反哺[11]。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分析框架,新时代社区教育空间应以“场所重构、情感联结、价值导向”为主:在物理维度实现从“聚合封闭”到“场景开放”的空间转向,在社会维度实现从“制度规划”到“情感共系”的空间转向,在文化维度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空间转向。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建构,通过彼此间良性地互动循环,进一步推动了社区教育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及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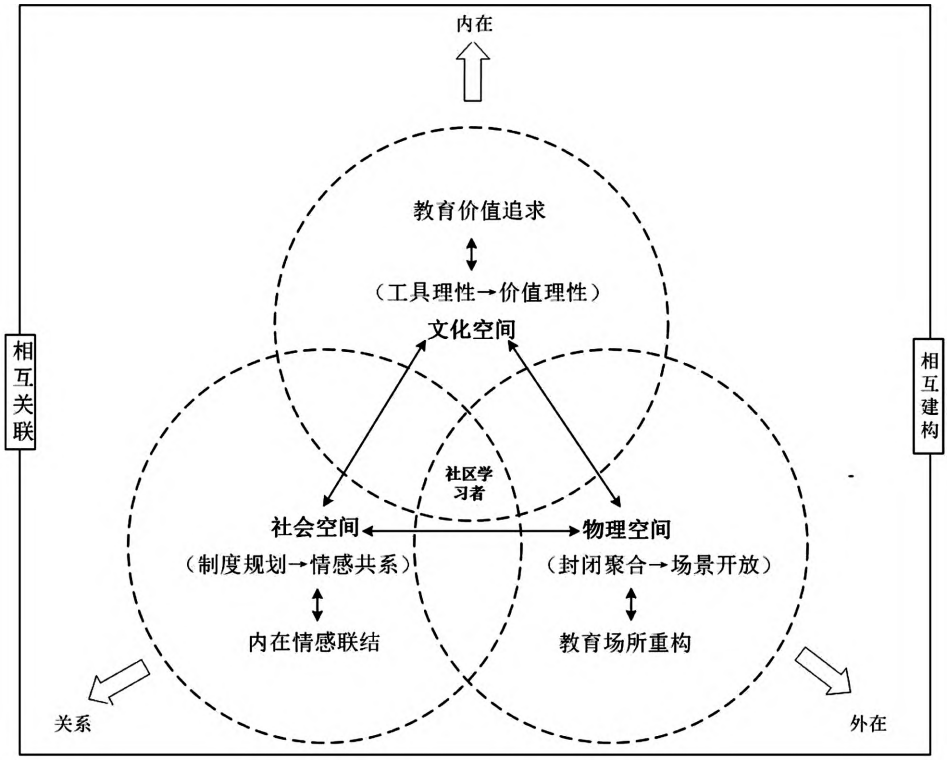

图 1　社区教育空间转向结构图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三、新时代社区教育的空间转向

“场所重构—情感联结—价值导向”作为社区教育空间生产关系的重要构面，彼此间的交流与互动在促进个体正式或非正式学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形塑着新的社区教育空间，而新的社区教育空间又为个体学习建构稳定的时空结构。通过物理空间的教育场所重构、社会空间的内在情感联结以及文化空间的人本价值导向，为新时代社区教育空间转向提供一种由“单维空间”转向“多维空间”且合乎规律的理论指引。

（一）从“封闭聚合”转向“场景开放”：物理空间的教育场所重构

物理空间是社区教育活动发生的载体，也是各教育要素相互关联的“物”的基础[12]。物理空间作为个体正式或非正式学习的基本物质空间，既可以被感知，也可以进行社会经验的生产与再生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们需求的不断变化，社区教育空间正逐渐从“封闭聚合”转向“场景开放”。城市社区建立于行政规划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区域性与封闭性。其空间布局和空间规划的权利大多由管理者决定，身处其中的学习者只能被动适应。受区域性空间特点影响，学习者在艺术走廊、文化中心等非正式或正式学习场所进行互动时，因交流机会受限，难以形成对社区教育场所的情感依附。与传统“在场”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将空间从地点逐渐分离出来的“缺场”社会。它在超越地域关系与地方性制度限制的同时，也推动了社区教育空间的智能化转向。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正逐步渗透并重塑着社区教育生态。这些技术的融入，促使学习内容与资源形态经历着深度重组。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网络化、符号化社会生活与社区环境的深度融合。基于此，形成了技术赋能下的新型社区教育场域，推动社区教育空间逐渐从同质化迈向多元化：既包括具体可感的实体建筑空间，也包括形形色色的网络虚拟空间。这种“虚实融合”的方式为社区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感载体和技术支撑。社区学习者不再是存在于实体空间的“区域人”，而是可以根据交往情境与学习需求，穿梭于任意空间的“公共人”。这不仅满足了其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有效促进了社区学习者身心状态的解蔽，还让其在与人、社区的社会互动中赋予了物理空间更多的意义，进而实现自身的社会性发展。

（二）从“制度规划”转向“情感共系”：社会空间的内在情感联结

社会空间是空间“社会性”的重要构面，它指的是在特定场域中个体间社会关系的空间结构，体现着空间的广延性与伸展性[13]。社区教育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空间，不仅是具有容纳功能的物质空间，还是一个弥漫着各种关系的社会空间。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治理从总体性支配权力模式转变为技术化治理模式[14]，以地域划分所形成的“陌生人社区”，在空间结构、组织制度上的边界与等级愈发明晰。社区不仅仅是人的汇集，也是组织制度的汇集[15]，它形塑个体行为并影响个体心理。在刚性秩序规范下，城市社区教育的开展多依赖于制度亦或是命令。社区学习者学习黏度低，参与教育活动也多属于“被动选择”。加之彼此间异质性的强化，致使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因素逐渐被淡化，难以形成紧密的学习共同体。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特点，社区教育需进一步重视居民的情感诉求[16]，具体表现是强化“情感共系”。“情感共系”是社区学习者以情感为纽带的相互联结，从而形成相互支持的关系状态。相关研究表明，积极的情感联结有助于社区学习活动的开展，即学习者通过情感交流获得支持，进而引发学习自觉。正如柏森格所言，“自己创造自己”，就是一种“自己运动”的形式[17]。伴随社会空间关系联结方式的转变，社区教育也逐渐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变。这既是社区学习者对物理空间意义积极建构的过程，也是对社会关系中符号意义阐释的过程。

（三）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文化空间的教育价值追求

文化空间展现了“人”在空间中的精神体验及价值认知。“人”既是社会关系性的空间存在，也是文化空间的创造主体。伴随社区物理空间场所的重构、社会空间关系的变迁，其文化空间的教育价值定位也逐渐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这意味着，社区教育空间的建构不能只停留于有形可感的物理层面与情感互融的社会层面，而要将物理层面与社会层面统摄于“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整体意义”[18]，以实现个体精神的充盈。西美尔曾言，城市人精神状态的主导是理性而非激情[19]。一方面，受传统思想影响，我国社区教育长期以来被视为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其人本价值并未体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调整、利益主体的多元及各种价值观的相互交织，造成了个人私欲的膨胀。工具化与功利化思想造成社区教育发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展的价值游离,其活动开展呈现出形式化、命令化特点。可见,工具理性理念主导下的社区教育已无法满足新时代“人对美好品质的向往以及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渴望”。社区教育地域性意义的更新、社会情感联结的增强及对工具理性现象的反思,提高了学习者对共同精神和群体归属的脱域性认同,并深化了对社区教育价值理性的认识。价值理性的目的合理性是以人为本,强调对人性的关怀及对人本身价值的认同,相对于工具理性,其更关注目的理性而非手段效用。也就是说,价值理性并不局囿于个体从学习谋生转向自我发展,而是追求个体和整体的和谐、共赢。在价值理性理念主导下所生成的文化空间,不仅有利于丰富社区教育的内容、形式,推动社区内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社区学习者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完善,还有利于引领社区共同精神的形成,实现“共居、共建、共学、共事、共享、共乐”的价值交融与生活互嵌。

四、社区教育空间转向的实践理路

“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20]社区教育空间突破了具有行政意味的物理性边界,从而呈现出区域空间的多样性。社区学习者在不同层次、不同结构空间的互动、融合中提升自我生命质量。基于上述对社区教育空间生产及结构分析,发现社区教育并非一项扁平化的实践活动,而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基于此,为使社区教育获得良好的实践效果,应针对不同空间构成要素,从物理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着手,探索构建新时代社区教育空间转向的实践理路。

(一)在社区物理空间推进教育共建

物理空间是社区教育共建的载体。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样态,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可感知的、具体的空间实体。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即时性的、交互的网络空间应运而生。然而,无论是实体空间还是虚拟空间,都需将现有的、闲散的资源进行盘活和利用。基于此,为推动社区物理空间的教育共建,一要加强社区环境共创,搭建教育活动载体。城镇化发展与社区前期规划存在不足,其活动场所存在设施不完善、功能不全面等问题。通过对既有教育空间进行改造和更新,如设计“绘制美丽楼道”“设计宣传标语”“培育社区花园”“清洁社区内垃圾”等具有教育性质的公共活动,或打造厨艺、茶艺、国学、中医药等教育实训室,进一步改善社区教育的活动场所环境,强化社区学习者与场所意义间的联结。二要加快社区网络建设,强化教育服务功能。网络平台作为社区物理空间的拓展补充,是个体学习的重要载体。将5G、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融入社区场景,构建老年大学、学习型社团、传统文化基地等多类型学习平台,创设亲子互动教育圈、学生校外教育活动圈、老年社团学习圈等多样化学习圈,推出网络学习教室、空中课堂、“空中驿站”等在线学习窗口,打造具有体验式和具身化的高质量网络学习空间,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三要统整社会资源,支持教育优质发展。社区教育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离不开外部资源的支持。通过对系统内不同资源进行加工、重组并使之相互联系、渗透,以进一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基于此,社区物理空间的规划应注重对不同资源的整合。如在社会协同方面,可通过联合公园、高校、图书馆等不同类型的单位,举办涵盖时事政治、草根文化等内容的教育主题沙龙;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可通过招募志愿者,建立以“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团体人员”“企业行业能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为主体的社区教育师资库。由此可见,多样的物态空间建设赋予了社区教育空间更为丰富的意义,并为其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建设奠定稳固的物质基础。

(二)在社区社会空间实施教育共治

社会空间是社区教育共治的基础。共治是空间生产的重要特征,其关注的焦点是“主体的参与性、能动性、互动性”[21]。基于此,为打破既有结构壁垒,激发社区居民内生动力,平衡多元主体诉求及深化内在情感认同,应坚持三管齐下,构建社区社会共治空间。一要刚柔并济,激发居民内生动力。内生发展理论将参与和认同的良性循环视为社区教育活动开展的基础,其中来源于地方性文化情境和个人内在情感的“认同”,是推动居民持续参与社区教育的重要动力[22]。基于此,为激发居民学习内生动力,一方面,可通过社区管理委员会、文明督导队等组织,管理社区事项、协调物业服务、分配社区资源,以进一步激活其主体意识并发挥其“居民领袖”的辐射作用;另一方面,可通过开展帮贫扶弱、促进就业创业等一系列活动,持续深化居民对社区教育的情感认同,并在最大程度激发其自我教育的意识。二要重构协作机制,推进社区多元共治。詹姆斯·博曼认为,协作是一个互为理性的对话过程,旨在处理那些需要通过“人际间的协作与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23]。为激发各类教育主体的能动性与创新性,推进多元共治,社区教育应坚持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以“需求导向”为基础,以“专业引领”为支撑,以“文化塑造”为核心,设计“组织联合”“资源联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享”“制度联商”的动态多元合作机制，形成以社区居民网格群、小组议事群、志愿服务群等为代表的多方协同、多域联动、多员参与的沟通服务机制，构建互赖互信、互通互用、互嵌互融的多元化、网格化运行机制，以实现社区教育空间各主体间的相互协作、沟通与连接。三要建立社区学习共同体，增强居民情感联结。社区学习共同体是“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因共同学习而结成的能实现生命成长和建立守望相助关系的群体”[24]。它不仅是个体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提高技能之地，更是促进学习者情感信任、沟通交流的“精神家园”。社区教育机构作为培育主体，应以人为本，明晰自身职责，通过合作交流、营造氛围、提供经费及场地的方式，支持组建师资队伍等，不断深化、拓展学习者间“互助共学”式的关系。这种较强的组织黏性使社区学习者间易形成一种“非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情感联结，并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其对学习共同体的情感认同。情感认同为社区教育的内生发展赋予了超越物理空间的丰富意义。它将社区学习者的个体特征和地方性社会结构相连，为聚合多方力量提供了重要纽带[25]。在权力、参与、制度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社区社会空间实现了再生产，它在与情感联结愈发密切的同时，还推动了社区学习共同体的自主发展。

（三）在社区文化空间实现教育共享

文化空间是社区教育共享的关键。“人类对某一特定空间普遍具有恋地情结，人类与空间深刻的情感联系赋予了其特定的文化意涵。”[26]这种文化意涵体现在“人”处于空间中所产生的精神体验上。基于此，为满足社区学习者的精神需求，社区应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丰富文化活动且立足本土文化开展活动。第一，打造社区教育品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社区教育品牌是以社区学习者为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特色鲜明、内涵丰富、贴近群众、融入生活”为原则而开展的一种教育服务项目，具有差异化、精细化、影响广等特点。通过将品牌建设与美术馆、体育馆等公共设施资源深度融合，将社区教育与实践基地、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巧妙结合的方式，培育一批具有社区特色的教育品牌。如北京市 M 社区通过与市图书馆、文化馆等进行合作，共同打造了中国国际合唱节、中国原创话剧展、中国童书博览会、北京东方艺术品博览会、北京阅读季以及万人走进艺术殿堂等一批特色文化品牌，在提升社区学习者文化生活品质的同时，发挥了社区文化空间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第二，丰富社区文化活动，形塑居民集体记忆。社区学习者通过特定的活动符号，想象并构建出专属的记忆空间，这种记忆在与社区教育空间的互动中会形成持续化的情感依附[27]。为深化居民对社区教育空间的情感及精神体验，需使其形成对社区教育的共同主观认知并建构共有的“集体记忆”。如在清明节前夕，组织社区学习者开展以“缅怀革命先烈，弘扬民族精神”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在重阳节期间，组织社区学习者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学习英雄人物事迹；在雷锋纪念日之际，组织社区学习者开展以“弘扬雷锋精神，建设和谐社区”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这些活动连接着时间、空间，承载着社区学习者对场所、事物的过往记忆与特殊情感，不仅有利于凝聚社区学习者的集体记忆，也有利于增进彼此间的亲密感、团结感，使之在历史的沉淀与文化的活力中实现社区社会空间的再生产。第三，立足社区本土文化，建设社区精神文明。社区教育与本土文化相辅相成，社区教育的本土化意味着社区教育受地域文化的浸润、影响。本土文化在未开发前以隐性方式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区学习者的思想方式、价值取向及行为习惯。基于此，为进一步丰富社区文化内涵、推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社区文化空间应高效利用既有资源，设计特色文化标识。以宁夏回族自治区 D 社区为例，该社区注重营造邻里文化，在城市变迁发展记忆和社区历史文脉梳理的基础上，强调凸显和合文化，通过创设承载传统民俗节庆、民间艺术表演等主题的邻里交往空间，进一步营造了多元、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同时，该社区高度彰显红色文化，通过打造“学党史、悟思想、守初心”主题教育阵地，提高居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明素养，切实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进而形成相互守望、积极向上的社区精神。

五、结语

本文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围绕“物理—社会—文化”三重维度，构建了“场所重构—情感联结—价值导向”的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了社区教育空间转向的可能及其实践理路，旨在为新时代社区教育实践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撑与经验启示。鉴于空间本身所蕴含的丰富层次与社区学习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之间存在着紧密且天然的联系，未来的社区教育发展应当聚焦于如何通过对社区内不同维度空间的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从而全面满足学习者在知识获取、技能提升之外的更深层次需求，尤其是自我实现与精神情感层面的高阶追求。这不仅是未来社区教育转向的重要方向，也是推动社区成为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个体终身学习、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高地的关键所在。持续探索与实践这一路径,对于促进社区教育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社区的构建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民政部,科技部,等.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EB/OL]. (2016-06-28)[2023-07-1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6n/xwfb_160729/160729_sfcl/201607/t20160729_273300.html.

[2]李盛聪,李宜芯,韩忆娟. 美好生活视域下社区教育的发展逻辑与现实困境[J]. 职教论坛,2019(11):92—100.

[3]姚茂华,舒晓虎.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6):108—116.

[4][10]钱旭初,施健. 论社区教育的空间及其教育的现代性[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33):70—75.

[5]陶磊,王永益.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之思:基于城市社区的考察[J]. 广西社会科学,2017(10):231—237.

[6]陈炜. 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基于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视角[J]. 教育研究,2022,43(9):150—159.

[7]郑震. 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J]. 社会学研究,2010,25(5):167—191.

[8]葛新斌,李佳. "组团式"教育援藏中本地教师教育空间重构的困境及对策[J]. 民族教育研究,2023,34(1):80—87.

[9]付强,辛晓玲. 空间社会学视域下的学校教育空间生产[J]. 山东社会科学,2019(4):74—79.

[11][21][26]郭淑云,冷向明. 国家如何助力社区成长?:来自空间生产视角的解释[J]. 城市发展研究,2023,30(4):67—73.

[12][18]王兴宇. 数字化转型对教育空间的塑造逻辑[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3(3):108—113.

[13]王寓凡,杨朝清. 空间视域下高校学生社区情感共同体建设[J]. 中国青年研究,2019(2):20—26.

[14]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9(6):104—127.

[15]帕克,麦肯齐. 城市社会学 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 宋俊岭,吴建华,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10.

[16]刘世清. 情感治理:后疫情时代教育治理变革的重要转向[J].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20:171—183.

[17]班华. 享受自觉学习者的幸福[J]. 人民教育,2018(6):78—80.

[19]南帆. 文学的城市:空间区隔与文化区隔[J]. 文艺争鸣,2022(7):13—22.

[20]李山. 社区文化治理:个体化社会的社区重建之道[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

[22][25]桑宁霞,樊云静. 内生发展视角下老年人参与社区教育研究[J]. 中国成人教育,2022(2):8—12.

[23]博曼著. 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 黄相怀,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5.

[24]项秉健,汪国新. 社区学习共同体探幽[J]. 教育发展研究,2017,37(1):9—15.

[27]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2.

Spatial Tur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Its Practical Path in the New Era

MA Xiao-fei[1], HOU Hui-hong[2]

(1. College of Edu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2.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With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content and place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related research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focusing on physical space to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the space they live in.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pace" profoundly affects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learners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oci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spac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find that it is not only a physical space, but also a social space and a cultural space. Driven by social mobility, the spac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gradually shifts from "aggregation and closure" to "scene opening", from "institutional planning" to "emotional co-connection", and fro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value rationality" in the process of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opening and intercommunication, thus promo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places, the connection of internal emotions and the change of educational value orientation.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hysics-society-cul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spatial tur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experienti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community education; spatial turn; practical path

(编辑/关永承)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